

兒少小說中的「壞媽媽」形象與親子關係重構

邵建欣*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兒少小說中的「壞媽媽」形象，以王文華的《我有媽媽要出嫁》、賈桂琳·威爾森(Wilson Jacqueline)的《刺青媽媽》以及姬特·皮爾森(Kit Pearson)的《地板下的舊懷錶》為研究對象，探究文本中的母親角色不被社會認同的原因。將「壞媽媽」形象導向「忙碌的行動描繪」、「矛盾的情感刻劃」、「特殊的相貌呈現」三項特質，而這些特質不被社會接納的深層底蘊來自於父權體制下的「母職」心態。本文主要以女性主義角度切入，並輔以海瑟愛情感政治理論考察壞媽媽的負面情緒。最後諦視這三個家庭如何重構失落的親子關係。筆者認為三個文本蘊含著家庭與女性議題：母親個人的創傷、追求其自主性與家庭照顧、孩子情感需求產生衝突。而在試圖解決家庭問題與親子衝突的過程中，更展現了不應被社會所低估的兒童形象。站在兒童主角的立場來看，「不合格」的母親往往只是社會的觀感，他們能感受與明白母親的深情與堅毅。三個文本隱含的更是針對社會眼光的反思，對於任何一種形式的家庭與母親，社會必須要了解其中的複雜性與困難，而不是簡單地標籤化給與否定。

關鍵詞：母親形象、親子關係、兒少小說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創作學系碩士班

一、前言

在兒童文學領域的創作中，母親是經常出現與被形塑的角色，因其對兒童的重要性與影響力。特別是父權社會中對女性的要求——社會的主流價值觀認為「女性應該成為母親，照顧好孩子」，建構了所謂的「母職」，使得親職工作全然成為女性的「天職」。這樣家庭制度與功能的建構，其實是對母親身分的一種限制與壓迫。這種價值觀也造成社會上出現了「模範媽媽」、「好媽媽」的單一扁平形象——必須圍繞著家務、育兒打轉，服膺社會期望，否則就會被貼上「壞媽媽」的標籤。因此，在兒童文學中，也多能看到為了家庭而心力交瘁的「好媽媽」形象，用以宏揚家庭功能與母愛的偉大。¹

不過兒童文學從較少人耕耘到現在的蓬勃發展，題材已經越趨多元化，除了校園生活、男女友誼、生活體驗、親子衝突，還包含校園霸凌、單親問題、家庭暴力、家庭經濟問題、特殊教育、外籍配偶等等面向現實生活層面的社會議題作為題材，顯然兒童文學不再只關注於溫馨的生活故事，還涉及現實問題與困難的解決，這些貼近現實生活的兒童文學作品，有助於促進兒少思考、體察社會生活，以及給兒童帶來面對困難的勇氣。

題材的多元化，也使得文本中刻劃的母親形象逐漸改變，不再只有「好媽媽」的單一形象出現在作品中，非典型的媽媽形象開始有人書寫，甚至是改變、失去其作為「母親」的功能，顛覆了「母職」這往常社會所給予的家庭功能定位。值得探究的是，文本中的「壞媽媽」形象是如何被塑造的？其與典型的「好媽媽」形象有何差異？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為何？壞媽媽的特殊性，又會對兒童產生什麼樣的關係與影響？本研究將以王文華的《我有媽媽要出嫁》、賈桂林·威爾森（Wilson Jacqueline）的《刺青媽媽》以及姬特·皮爾森（Kit Pearson）的《地板下的舊懷錶》為研究對象，探討以上問題。選材範圍方面，因為這三個文本中的母親都有某種不對兒童言說的痛苦，她們選擇壓抑、獨自承受自己的創傷，而這種個人的痛苦會與親子間的情感、社會的價值產生何種交互關係與影響呢？這是本論文的出發點與嘗試探討的。其中「壞媽媽」是定義為與社會大眾眼光與期待不同的母親，她們具有特殊性，並非是真的「壞」，以下將探討「壞」的緣由以

¹ 兒童文學中，宏揚母愛偉大與刻劃女性具家務責任的「好媽媽」形象的作品不少，例如：繪本如墨菲《讓我安靜五分鐘》、酒井駒子《我討厭媽媽》、佐藤和貴子《洗個不停的媽媽》等。小說如佩特莉霞·麥拉克倫《又醜又高的莎拉》、伊藤未來《媽媽使用說明書》、陳美妙《老師媽媽》、花格子《媽媽的愛，有幾斤？》等。

及實質內涵、親子關係的影響。

研究方法方面，主要以女性主義的角度切入，包括米列（Kate Millett）《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中性別與權力的關係、里奇（Adrienne Rich）提出關於母職的矛盾情感，以及沃爾夫（Naomi Wolf）指出父權社會對女人外表的規範，探討文本中母親形象的塑造，並輔以海瑟愛（Heather Love）的情感政治觀點，考察母親的負面情緒對家庭的影響。

二、「壞媽媽」形象的塑造

《地板下的舊懷錶》、《我有媽媽要出嫁》與《刺青媽媽》這三本小說中的「壞媽媽」擁有某些共同特質，區別於文本中的其他母親角色，而不論這些特質是正面還是負面，的確都在各自的文本中形成一個獨特又鮮明的角色形象。這些與常人不同的行為特質，以及他人的批評譴責，都顯示著這些媽媽在社會文化的脈絡下，是與大眾所期待的母親角色相互違背的。以下分析三本兒少小說如何塑造不合格的母親形象，並從女性主義的角度探究其如何顛覆社會、文化所建構的傳統母親的角色觀念。

（一）忙碌的行動描繪

三位媽媽經常無法陪在孩子身邊，他們有的忙於工作，有的忙於玩樂，經常匆匆的來又匆匆的離去。如《地板下的舊懷錶》中主角派翠西亞的媽媽露絲，是一位強勢又幹練的名主播，很少待在家中陪伴派翠西亞，甚至為了安心工作，總是安排一大堆的課後活動給女兒。《我有媽媽要出嫁》中鐵男與鐵花的媽媽秀英同樣因為忙碌的工作而無法陪伴孩子，丈夫意外失蹤讓她不得不一肩扛起家計，除了要負擔房租、生活費與兩個孩子的學費，她還背負著丈夫買漁船欠下的債，因為學歷不高因此選擇在酒店上班，並往往工作到深夜才回家。而《刺青媽媽》中同樣是單親媽媽的金盞花，則是常常趕著出門玩樂而疏於照顧兩位女兒。金盞花喜歡花大把的時間參加酒吧舉辦的派對、設計自己喜歡的刺青圖案、聽樂團的演唱會、交男朋友等等，有時甚至徹夜未歸。兩姊妹因為母親疏忽的照顧與關心，經常有一餐沒一餐，一切都要靠自己打理外，她們的情感需求也無法被滿足，時常找不著夜不歸宿的母親，一整晚焦急又擔憂的等待著金盞花回家，她們的母女關係似乎錯置了——女兒反而在家裡替出門遊玩的母親擔心。這樣子的顛倒錯置，將女兒對母親的情感依附顯露無遺，也表現金盞花做為母親在家庭角色中的失職。

觀察文本中的三位母親形象，她們忙碌的行動描繪或為了工作，或為了玩樂，

都違背了母親角色在家庭中的職責，也就是所謂的母職。母職是在父權社會下所產生的價值觀念，根據米列（Kate Millett）《性政治》（*Sexual Politics*）的說法，父權體制誇大了男女生理上的差異，藉由男女角色刻板化的過程，建立男性的統治地位。米列認為一切的權力關係都根植於性別，是以一群人支配另一群人的權力結構來看待兩性關係。性政治通過兩性的交往，獲得對氣質、角色、地位這些男權制基本手段的認同。²而母職便是基於男尊女卑的地位、無知與順從的性別氣質（相較於男性的智慧與力量），進一步規範出的性別角色，內容包括料理家務、照管孩子等家庭內部的事，因此家務事成為女性的本分。這樣的男權制是社會的常數，普遍存在於各種政治、社會、經濟制度中，當然，同時也影響了文學創作。文本中三位母親無暇顧及孩子的生理與心理需求，違背了父權文化所認同的母親角色。這些在父權脈絡下母親角色的失職與失能，作者有意或無意地呈現了批判性的比較意味。《地板下的舊懷錶》中善於照顧孩子的金妮阿姨，不只與她的四個孩子關係良好，她的溫柔與關愛更融化了派翠西亞的戒心，與重視工作並且跟女兒產生隔閡的露絲形成強烈對比，露絲擅長且致力於家庭外部的事，金妮則是稱職的家庭主婦，在文本中作者雖然沒有明顯的價值批判，但透過露絲一家的家庭衝突以及失敗的婚姻，對比於金妮一家的融洽，兩個極端的形象已無意間塑造了「模範媽媽」與「健康的家庭模式」印象。而《我有媽媽要出嫁》中與秀英形成對比的是時常關照鐵男、鐵花的鄰居張阿姨，結局更以剝奪監護權的方式否定秀英的母親角色。《刺青媽媽》中的金盞花亦如是，他與寄養孀孀形成對比外，最終被送進了精神病院與兩個女兒分開。小說刻劃忙碌的母親形象同時，情節走向反映了傳統的價值觀念——沒有善盡母職的母親，其身分有被社會剝奪的可能，被社會否認女性在家庭中的價值與功能，最嚴重的結果便是親子分離。

（二） 矛盾的情感刻劃

三本小說對於「壞媽媽」的內心刻劃也多展現出一種矛盾的情狀。她們能夠體認到自己作為母親的失敗，也希望可以藉由改善親子關係或是提升家中的經濟狀況來好好照顧孩子，但總有許多內外因素而導致失敗，回歸到原本疏遠的親子關係或是失能的母親角色。

如《地板下的舊懷錶》中的媽媽露絲，熱衷於工作帶來的成就感，她將工作

² Kate Millett, *Sexual Politics* 《性政治》,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0), p.86. 轉引自 Patricia Ticineto Clough 著，夏傳位譯，《女性主義思想：慾望、權力及學術論述》（臺北：巨流，1997年），頁42。

當成生活的重心，因此與女兒關係疏離。她曾試圖改善親子間的關係，但強勢的性格只換來了女兒的不認同與不理解。而《我有媽媽要出嫁》中時常酗酒的秀英也渴望當個好媽媽，給孩子們穩定的生活，但越來越遭的經濟狀況讓她更離不開酒精的催眠與麻痺。《刺青媽媽》中的母親金盞花，則始終徘徊在玩樂與照顧家庭的兩難中，她渴望改變現況以及獲得女兒們的認同，但一次次地跟隨本心而總以失敗告終。

三個文本中母親的矛盾情感，體現在自我、自主與母職、母性的拉扯之間。露絲對於工作上自我成就的追求，與家庭照料、成員關係的維繫產生衝突。秀英的酗酒行為是意識到自己沒有能力執行母職後的自我放縱，是女性個體向母親一職歸化的失敗，並以酗酒的方式試圖抽離社會壓力與子女期待。金盞花喜歡玩樂的性格與他人（女兒及社會）的期待產生衝突。文本中女性產生矛盾、衝突、壓抑的形象，展現女性在父權體制下的母職觀念，以及親子的情感中難以保有自我，並且往往被強迫扮演符合社會期待的好媽媽（儘管她們並不適合）。美國女權主義者里奇（Adrienne Rich）的自傳陳述《女人所生：母職作為一種經驗與制度》（*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中，曾提及過這種痛苦的母親經驗：

我的孩子帶給我所能感受到最尖銳的痛苦。這是一種矛盾的痛苦：在劇烈的憎恨及神經質之間，在極幸福的滿足及慈愛之間致命的交替。有時，我在自己眼中成為自私與不寬容的怪物……我愛他們。但正是在這巨大與不可避免的愛之中，存在著痛苦……因為我一直恐懼的正是死亡——用我整個生命化為戰場來催生的、幾乎不曾誕生的面容的崩潰死亡——一個可分辨的、獨立的自我，在詩與生命中有所創造。³

里奇陳述自身的哺育經驗存在一種「憎恨與慈愛」的矛盾，憎恨的情緒來自於教養孩子所受到的挫折，以及無私的母愛、對家庭的責任感所造就的個人獨立性的消亡。里奇陳述的痛苦經驗是「做母親」與「做獨立自我」的分裂，並且她認為這種分裂是源自女性生活於其中的男性文化，因為父權社會中做為習俗的母

³ Adrienne Rich, *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 (女人所生：母職作為一種經驗與制度) (New York: Norton, 1976), pp. 13-14. 轉引自 Patricia Ticnieto Clough 著，夏傳位譯，《女性主義思想：慾望、權力及學術論述》（臺北：巨流，1997年），頁 77。

性，壓制、削弱了女性的潛能。而文本中三位「壞媽媽」個體的自主性，正是在父權文化下的母性經驗中產生分裂與迷失，親子間的情感羈絆以及母職觀念忽略了女性的能動性，與女性自主產生了強烈矛盾。三個文本所刻劃的家庭空間，已然成為女性不自由的場所，這種不自由源自父權社會給女性的定位（母職）的壓迫。如此，應該重新審視家庭與女性個人之間的關係，女性自由的、自我的形象與家庭中擔任的母親角色，到底有沒有可能達成某種和解？

（三）特殊的相貌呈現

綜觀三本小說，可以發現文本中形塑的三位「壞媽媽」的外貌，都呈現出異於常人的模樣，或是擁有特別美麗出眾的相貌，容易引人注目。似乎除了行為、性格上的特殊，更要藉由特殊外表強調她們獨特的母親形象。

如《地板下的舊懷錶》，身為名主播的媽媽露絲有著美麗的外貌，走在路上時容易引起路人的眼光與討論：

派翠西亞並不意外，媽媽一向很有魅力。有一次，她拜訪派翠西亞的學校，結果每個人都熱烈的談論她。⁴

而即便是回到家族之中，她也是最受人注目的一位。有一次露絲處理好與丈夫的分居問題後，到金妮阿姨家準備陪女兒度過剩下的假期，但當她抵達時，卻在眾人間顯得格格不入：

不過，媽媽一向懂得看場合打扮。她換上了棉布短褲和短袖印花上衣。但就算這麼穿，對湖邊的人來說，還是稍嫌正式，也太乾淨了一點，她整個外表跟其他人顯得格格不入。⁵

⁴ Kit Pearson 著，鄒嘉容譯：《地板下的舊懷錶》（臺北：東方，2000年），頁237。

⁵ Kit Pearson 著，鄒嘉容譯：《地板下的舊懷錶》，頁236。

透過這種格格不入與美麗的外貌，區別了露絲與文本中其他媽媽的形象，例如又矮又胖的金妮阿姨、長相普通的喬安娜（派翠西亞爸爸的女朋友），而這樣刻意呈現的差異，強調了露絲對外貌的講究與自我的要求。這樣的講究其實是一種武裝，藉由乾淨整潔、毫無瑕疵的外表來武裝自己，不論是對路人、親戚還是派翠西亞都以完美的面貌呈現，隱藏包裹在華麗外貌下的脆弱與不安。露絲遮蔽了真實的自我也造就了親子間的疏離感。且相較於外貌美麗但與女兒產生隔閡的露絲，那又矮又胖的金妮阿姨對於照顧孩子可以說是得心應手。兩位母親的外貌與教養能力形成鮮明反差，這容易使讀者衍生出刻板的解讀——年輕又美麗的媽媽比較不會照顧小孩。

而《我有媽媽要出嫁》中的母親秀英，外貌也是非常亮眼，她既年輕又漂亮，故事一開始便是鐵男打電話到廣播節目上，要替漂亮的媽媽徵婚（故事採倒敘法，開頭秀英便接獲了法院的判決，必須將孩子的監護權交給阿嬤，而兩個孩子擔心秀英一個人生活很孤單，便有了替她徵婚的想法），也因為秀英的年輕美麗，這個故事才有這麼特殊的展開，不只是兩個孩子，連秀英的好友們都覺得她年紀尚輕而支持她再嫁，因此這個看似無關緊要的外貌設定，其實在情節推演上佔了舉足輕重的位置。此外，這個設定大抵也是她能夠在酒店上班的原因（酒店的工作可以多賺一筆小費，相較於其他工作是比較賺錢的，因此秀英選擇在酒店上班），也因此造成秀英嗜酒的惡習，進而喪失了兩個孩子的監護權。秀英做母親的失職與她所選擇的職業有關，而這職業又源自於出眾的外貌，文本這樣的角色刻畫，使得美貌的評價，在母親身分上不再是個單純的褒義詞，反而蘊含了某種貶抑意味。

而《刺青媽媽》中金盞花的外貌則更為特殊，除了漂亮的相貌與時髦的穿著，更有一身引人注目的刺青。以社會上大多數人的價值觀來看待刺青，多為負面評價，被認為是一個病態的、悖德的、傷害身體的行為，何況是在身為人母的金盞花身上，可能會給孩子帶來負面影響，因此遭受眾人的排斥與譴責。但金盞花面對他人的批評依舊我行我素，因為對她來說，刺青是一個將生命中重要事物記下的方式，每一個刺青都有一個重要的象徵意涵。金盞花的外貌與他人期待的巨大落差，正是要強調金盞花與常人不同的性格與價值取向。這的確展現了一個特殊的、自我的、不被社會價值觀給綁住的、非典型的母親形象。但值得注意的是，金盞花的女兒表達過她寧願金盞花是上了年紀的老媽媽。因為她覺得那種不引人注目、穿著不古怪、擁有平庸外貌的才是正常的媽媽。作者致力於塑造不被社會價值觀綁住的母親形象，但將女性特殊的外貌與母親角色的失能產生連結，其實已間接表達了這種類型的母親不能夠成為好母親的偏見。

三個文本中「壞媽媽」的亮麗外貌設定，無意間將「外貌出眾、特別的媽媽」與「不合格的母親」畫上等號，這或許不是刻意為之，但這樣的描繪間接地反映了一刻板印象——年輕又美麗的媽媽比較不會照顧小孩。必須深究的是，為何美麗的媽媽容易被貼上無能的標籤？美貌與能力難道不能共存？母親角色功能的壞與女性的美之間有何關連？又為何會有關聯？

針對這些問題，美國女性主義者沃爾夫（Naomi Wolf）在其著作《美貌的神話》（The Beauty Myth）中給出了解答：

女人在男人為主的文化裡一向只是「美女」，而文化也因此得以常保男性優勢。當女人在這種文化中顯出個性時，和無知的天真少女比起來，就不受歡迎了。美麗的女英雄是矛盾的角色，因為英雄的本質是有個性的、有趣和不停地改變的；而美女卻是平凡的、無聊的和無行動能力的。⁶

在以男性為主體的文化場域中，女性成為男性用來陪襯的、被物化與操作的客體，因此這種文化關注與推崇的僅僅是女性美麗的外貌，而不強調其內在價值，不然男性會有失去主體性的風險。因此，美女作為男性的裝飾物與附屬，他們不被要求具備內在涵養與學識，這種文化將美女塑造成無個性的、無須思考的刻板形象。沃爾夫借美麗的女英雄做比喻，集美麗與能力、智慧於一身的女性是一個矛盾體，因為在這樣的文化場域中，美麗與能力、智慧相互衝突，他們的共存是不被接受的。這樣的刻板印象進一步形成兩極化的分類：

文化將女人定形化，藉著將女性氣質解釋為「美麗而沒有腦筋」或「有腦筋而不美麗」，來附和美貌的神話。女人等於只準有頭腦或有肉體，但不能同時兼得。⁷

三個文本中的壞媽媽雖然都有「腦筋」，但同時都沒有「育兒能力」。文本並沒有陷入「美麗而沒有腦筋」的迷思，卻另外跳入了「美麗而沒有育兒能力」的

⁶ Naomi Wolf 著，何修譯：《美貌的神話》（The Beauty Myth）（臺北：自立晚報，1992年），頁64。

⁷ Naomi Wolf 著，何修譯：《美貌的神話》（The Beauty Myth），頁65。

圈套。

三個文本致力於塑造另類的母親形象，試圖挑戰傳統的母親典範，其中刻劃出在自我與家庭之間產生矛盾的母親形象，讓讀者重新思考家庭與女性個人之間的關係，不過將擁有美麗外表的女性，連結育兒的失敗，在某種程度上不小心延續了傳統的刻板印象。

三、「壞媽媽」的壞情緒

文本中的母親在社會中顯得格格不入，尤其是《刺青媽媽》中的金盞花，形象最為特殊，在故事中不斷受到他人的指責與輕蔑。而這種社會的難以介入與排斥，會影響其情緒與自我評價。此節將以海瑟愛（Heather Love）的情感政治觀點，考察母親的負面情緒對家庭的影響。

文中的金盞花時常出現焦躁、不安、自恨、自卑與羞恥的負面情緒，這些情緒源自於公領域與私領域的遭拒經驗，前者是社會的不接納，後者是家庭成員（女兒與男朋友）的不認同。海瑟愛認為，酷兒是透過羞恥、隱密性、自恨等模態來經驗他們的身分認同，而這種身分認同是他們對於社會傷害的一種共享的回應。⁸因此，金盞花的這些負面的遭拒經驗將持續內化，被自身吸收沉澱，最終，將形成金盞花自我的核心（身分認同），促使她意識到以及認同自我在社會中的邊緣處境與特殊性。

羞恥、自恨的負面情緒所產生的作用，是讓金盞花不斷展現分裂的自我。她依照自己喜歡的方式存活，卻同時產生強烈的自卑與羞愧。在面對自身慾望與社會要求的兩難時，金盞花往往選擇前者，但最終總產生沮喪與羞愧的情緒，認為自己是位壞媽媽。前一節談論過此種矛盾的情狀，是因為社會壓力與女性自主性的相互抵觸，而負面的情緒在其中運作、表現，它源自於具審視性與排他性的社會，是自身無法滿足社會期望而產生的。

負面情緒也造就親子間錯位的關係，小女兒海豚常常照顧金盞花的情緒，總是安撫她、鼓勵她，因此海豚時常覺得好像她才是媽媽——這是母女關係顛倒的錯覺。而負面情緒亦造成親子間關係的崩毀，大女兒不想再遷就母親古怪難測的情緒憤而離家。不過負面情緒最為嚴重的影響，是使個體脫離了社會性的世界。

⁸ Heather Love 著，張瑜珮譯：〈論情感政治：感覺倒退、感覺「背」〉（*On the Politics of Emotion: Feeling Backward, Feeling Bad*），收入林家瑄、楊雅婷、張永靖、張瑜珮、劉羿宏 編：《酷兒·情感·政治：海澀愛文選》，頁 179。

男友的拒絕與女兒的離去使金盞花產生強烈的負面情緒——激烈的羞恥與自恨，促使金盞花將白色油漆塗滿全身，試圖以「純潔」的白遮蔽滿身的刺青。羞愧與自恨的負面情緒摧毀金盞花原始的信念，讓他接受刺青的悖德指控，不過，負面情緒並沒有因此幫助他成功涉入常人所在的社會世界，反而將他越推越遠，使他進入某種異樣的精神狀態，無法與人正常溝通。這與巴特勒（Judith Butler）討論的性別憂鬱有類似概念：⁹

處於憂鬱之內，並不只是失落了某個他者，或是某種意識失去的理想性，而是讓這份失落成為可能的社會性世界也同時佚失。憂鬱者並不只是從意識層面與所失落的對象分離，憂鬱者也退入某種精神構造，與社會性世界脫離。¹⁰

負面情緒的終極展現，是將個體從支撐這種負面情緒的社會世界中去除，遭到毀滅的個體已無法向自身的理想靠攏，也無法進入社會世界，被全然的排除。

《地板下的舊懷錶》母親露絲，其心底最深層的憂鬱來自於小時候家庭中性別不平等的對待。從小她對生活充滿活力與企圖嘗試的心，但卻因為父母與哥哥的性別偏見而處處受到壓抑，她的活力在原生家庭經常被認為是不正常的，她對生活的熱情嘗試被視為一種女性的異類，這種壓抑與痛苦造成她與原生家庭的不睦，並且逐漸轉變為露絲追求事業的熱誠與決心。女兒派翠西亞在故事剛開始，還未知母親陰鬱的童年前，對於母親積極追求事業的態度而忽略了對自己的陪伴，是帶有一點怨懟與距離感的，她也不能理解為甚麼露絲總要表現的這麼強勢。因此，露絲強勢與自信的表面下所隱藏的陰鬱來自於原生家庭對她特殊性的拒絕：這種遭拒經驗產生了壓抑的負面情緒，進而轉變為露絲不肯向偏見低頭、自我成長的動力，最終卻忽視家庭成員間的關懷與聯繫，使兒童主角產生失望與孤單。但隨著情節推移，派翠西亞獲得了可以一窺露絲童年時光的懷錶，她看見了表面光鮮亮麗的母親背後曾經受到的種種挫折與憂傷，她開始能理解露絲強勢、以及

⁹ 巴特勒引用佛洛伊德的憂鬱概念，將同性情欲的隱藏，論述出憂鬱的性別。

¹⁰ Judith Butler, *Psychic Life of Power* 《權力的精神生命》（San Francisc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p.181. 轉引自 Heather Love 著，洪凌譯：〈毀壞的身分認同〉（*Spoiled Identity: Stephen Gordon's Loneliness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Queer History*），收入劉人鵬、鄭聖勳、宋玉雯編：《憂鬱的文化政治》（臺北：蜃樓，2010年），頁256。

不斷證明自己的性格，這成為修復親子關係的契機。

而《我有媽媽要出嫁》的秀英，她的「壞」體現在對家庭經濟狀況、孩子情感需求的無法滿足，以及無法戒掉的酗酒行為上。深究「壞」的來源，是她喪偶的痛苦與獨自扶養孩子的沉重壓力。失去家庭主要的收入來源，她努力工作要改善家中經濟狀況，因此沒有時間陪伴孩子，但惡劣的經濟情況不曾好轉，這龐大的壓力與丈夫離世的憂傷促使她只能以喝酒的方式逃避痛苦，以至於社會雖然同情秀英，但更多的是對她的不認同，更要剝奪其監護權。

三位母親帶有各自的創傷、壞情緒（受到原生家庭偏見對待的露絲、被社會歧視的金盞花、喪偶獨自養孩子的秀英），而這未解決與正試圖解決的創傷與負面情緒進一步產生了母親角色的「壞」（熱衷工作的露絲忽略女兒的陪伴需求、秀英酗酒行為、金盞花的特殊性被標籤化，以及最終強烈的自卑感使她墜入某種精神的異常，無法照顧孩子）。壞媽媽的「壞」，與她的特殊性不受外界認同而產生的負面情緒息息相關，同時負面情緒容易帶來親子衝突，但也能給孩子、家庭帶來成長的機會。

四、 親子的關係重構

接續上一節「壞媽媽」的壞情緒對兒童主角的影響，探討壞情緒衍生的親子矛盾與衝突如何獲得解決，重建親密關係。

《地板下的舊懷錶》的故事開頭，母女關係是疏離的，兩人性格上的差異與對彼此期望的落差造就了雙方的誤解與敵意。而一整個故事可以說是派翠西亞試圖理解、諒解母親的旅程，她偶然間獲得了一個可以帶她回到過去時光的懷錶，也因此看到了母親露絲苦悶的成長過程，她逐漸了解母親強勢的外表下其實擁有一顆脆弱與孤獨的內心，這份理解更成了兩人關係修復的契機。文本中親子關係的修復方式是雙向的，女兒試圖去理解母親的強勢與疏離，母親則主動向女兒坦承心事。故事中派翠西亞不斷學習包容與理解，最終親子雙方表達對對方真摯的關愛而解除誤會。略為可惜的是，直到故事的最後，都未提及母親露絲如何協調工作與家庭的關係，只以母女間的矛盾解除，以及派翠西亞將跟著母親到新的國家展開新的生活做結。值得注意的是，露絲在故事中與丈夫離婚，她將單獨照料派翠西亞，所以露絲對於家庭的看顧照料，或許要比以往花費更多心力，但面對即將展開的新工作，熱衷於事業的露絲會甘願放棄？這不免會令讀者擔心，矛盾真的解決了嗎？未來露絲與派翠西亞或許會產生更多衝突。

相較於其他兩個文本，《我有媽媽要出嫁》中，沒有出現激烈的親子衝突，兩個孩子能夠理解秀英的忙碌，偶爾因為孩子無理取鬧而發生的小爭執，也透過秀英的包容化解。秀英總義無反顧的為家庭付出，這樣的設定塑造出一個母親角色失能、但卻充滿母愛與堅毅的母親形象，讓失敗的母親角色有被補償的可能。而兩位兒童主角也在各種家庭危機與困難（經濟危機、惡劣親戚關係、母親住院等等）中一步步成長、成熟，也讓母子三人情感更加緊密。

而《刺青媽媽》中的家庭關係衝突不斷，因為金盞花不能滿足大女兒星星的期待，強烈的自卑感導致她喪失育兒能力，不過母親的失能也導致了小女兒海豚展開尋父的旅程，她漸漸體認到自我的價值與變得更勇敢，母親負面情緒間接促成小女兒成長的機會。而最後修復三人親子關係的關鍵在於金盞花接受心理醫生的治療，她體認到自己不是一個好媽媽，懊悔之餘也試圖改變。結尾有一個橋段值得深究：

「看哪！她竟然在漂亮的小鼻子上，穿一個釘子！星星，你怎麼能？這像甚麼樣子阿！」她不停數落著，好像她是世界上最傳統、最普通的媽媽，身上清清白白，沒有一個刺青。¹¹

結尾所營造快樂的氛圍，體現在金盞花接受治療後的「好轉」，除了精神方面回歸正常，思想也「正常」了，像個傳統的老媽媽一樣數落著穿鼻釘的女兒。母女三人間惡劣的親子關係，靠著金盞花向傳統母親形象靠攏得以修補。這樣以「回歸正常」為解決辦法的情節設定，沒有正視金盞花差異性與特殊性的問題，酷兒主體的負面情緒當然也沒有被注意，金盞花的負面情緒——羞愧、自卑沒有獲得解決，反而隱藏在他扮演的傳統母親角色之下，這是比較可惜的部分。不過最值得注意的是小女兒海豚對母親的真摯感情，她不在乎母親到底是不是一位合格的母親，她肯定母親的特殊性，她喜歡金盞花的天真、浪漫與充滿想像，以及她全身美麗的刺青，雖然金盞花的母親身份始終不受社會認同，但在海豚身上得到了全然的價值肯定。

三個文本塑造出非典型媽媽的形象與特殊的親子關係，雖然刻劃出的都是「不完美」的母親形象與家庭型態，但能夠讓讀者看見她們的獨特性，並在這種

¹¹ Wilson Jacqueline 著，沙永玲譯：《刺青媽媽》（台北：小魯文化，2005年），頁297。

不完美的母親形象下呈現出兒童的成長經歷，以及親子間相互守護、關愛的真摯情感，若站在兒童主角的立場來看，其實母親最重要的不是如何成為一位多麼完美的母親，而是在這不完美的家庭互動中，獲得彼此成長的契機，也讓負面情緒有得以抒解的可能。

五、 結語

本研究以王文華的《我有媽媽要出嫁》、賈桂琳·威爾森的《刺青媽媽》以及姬特·皮爾森的《地板下的舊懷錶》為研究對象，探討兒少小說中的壞媽媽形象如何顛覆傳統社會的價值觀，並考察壞媽媽負面情緒的來源以及在親子關係間所產生的影響。其中母親的形象歸納出「忙碌的行動描繪」、「矛盾的情感刻劃」、「特殊的相貌呈現」三個面向，揭示在父權體制下的文化場域中，甚少陪伴孩子、追求女性自主，以及擁有美麗外貌的女性，往往被視為不合格的母親。三個文本致力於塑造另類的母親形象，試圖挑戰傳統的母親典範，其中刻劃出在自我與家庭之間產生矛盾的母親形象，讓讀者重新思考家庭與女性個人之間的關係，不過將擁有美麗外表的女性連結育兒的失敗，並以向傳統母親靠攏的方式作為親子衝突的解決辦法，在某種程度上不小心延續了傳統的刻板印象。

壞媽媽的「壞」，與她的特殊性不受外界認同而產生的負面情緒息息相關，雖然負面情緒容易帶來親子衝突，但也能給孩子、家庭帶來成長的機會，能作為審視親子關係與進一步了解對方的契機。三個文本表達的是對於多種樣貌的母親形象與家庭型態的關懷，其中蘊含家庭與女性議題：母親個人的創傷、追求其自主性與家庭照顧、孩子情感需求產生衝突。而在試圖解決家庭問題與親子衝突的過程中，更展現了不同於社會所低估的、勇敢有主見的兒童形象。三個文本隱含的更是針對社會眼光的反思，對於任何一種形式的家庭與母親，社會必須要了解其中的複雜性與困難，而不是簡單地標籤化給與否定。

徵引書目

- Adrienne Rich. *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 New York: Norton, 1976. 轉引自 Patricia Ticnieto Clough:《女性主義思想：慾望、權力及學術論述》，臺北：巨流，1997年
- Heather Love.〈毀壞的身分認同〉，收入劉人鵬、鄭聖勳、宋玉雯編：《憂鬱的文化政治》，臺北：蜃樓，2010年
- Heather Love.〈論情感政治：感覺倒退、感覺「背」〉，收入林家瑄、楊雅婷、張

永靖、張瑜珮、劉羿宏編：《酷兒·情感·政治：海澀愛文選》，臺北：蜃樓，2012年

Judith Butler. *Psychic Life of Power*. Stanford, C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轉引自 Heather Love. 〈毀壞的身分認同〉，收入劉人鵬、鄭聖勳、宋玉雯編：《憂鬱的文化政治》，臺北：蜃樓，2010年

Kate Millett. *Sexual Politics*. New York : Ballantine Books, 1970. 轉引自 Patricia Ticnieto Clough. 《女性主義思想：慾望、權力及學術論述》，臺北：巨流，1997年

Kit Pearson . 《地板下的舊懷錶》，臺北：臺灣東方出版社，2000年

Naomi Wolf . 《美貌的神話》，臺北：自立晚報，1992年

Patricia Ticnieto Clough . 《女性主義思想：慾望、權力及學術論述》，臺北：巨流，1997年

Wilson Jacqueline . 《刺青媽媽》，臺北：小魯文化，2005

